



趙樸初佛教文化論思想研究

近閑法師

中國佛學院棲霞山分院講師

前言

趙樸初（1907-2000）作為中國佛教界著名領袖，不僅在於他對佛教卓越的貢獻，還在於他提出了諸多影響中國佛教走向的著名論斷，如：「一個思想三種傳統」、「佛教是文化」、「佛教六性」、中國佛教的「三性說」與「三化說」、「中日韓佛教黃金紐帶」等等。這些論點引起當代佛教相關人士的激烈思考與持續回應。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屬於文化思潮復興的年代，其復興形態具體反映於「文化熱」，亦即文化界所掀起的對古今中西文化的深度傳播與互動。趙樸初順應時代因緣，敏銳地提出「佛教是文化」之論斷。近年來，關於趙樸初思想的研究成果頗多，但整體而言，大多側重於圍繞「一種思想三個傳統」中的「人間佛教」思想（此觀點尤為佛教界稱道）研究，但剖析其「佛教是文化」之觀點相對較少，而對作為提出「佛教是文化」重要助緣之「文化熱」思潮，則鮮有提及。因



趙樸初居士是近代中國佛教界的著名領袖

此，重新考察趙樸初「佛教是文化」觀念的提出意義、實際作用與相關影響，或許可以作為當代中國佛教發展之借鏡。

一、「佛教是文化」的提出因緣

趙樸初正式提出「佛教是文化」是在 1986 年。在此之前，他雖然指出了佛教在文化領域的重要性，但是並沒有直接道明「佛教是文化」。¹1986 年，在「文化熱」的思潮激發下，出於糾正部分人士關於傳統文化的認識誤差與偏見，趙樸初提出「佛教是文化」的鮮明觀點。他說：

文化問題，是最近思想文化界討論的「熱門」論題。傳統文化的討論，又是這「熱門」之中的興奮點。……我看中國傳統文化也應包括佛教文化在內。現在有一種偏見，一提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²

在〈要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一文中，他進一步重申：

佛教在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新文化過程中還有沒有作用？人類文化發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斷。我們要汲取傳統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

1. 如 1980 年底，他在〈中國佛教協會第三屆理事會工作報告〉中指出，「佛教優良傳統是很多的。例如佛教哲學、文學、音樂、繪畫、雕塑、建築、醫藥等，佛教所謂『五明之學』，在中國文化領域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應當得到大力保護、繼承、研究和發揚」。趙樸初：《趙樸初文集》，北京：華文出版社，2007 年，頁 451。

2. 趙樸初：〈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趙樸初文集》，頁 801。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期

精華來充實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新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內。現在有一種偏見，一提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對中國文化的貢獻。³

在他看來，「宗教是文化，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實體，不論國內國外，宗教同政治、經濟、民族等重大問題有很深很密切的聯繫」。⁴基於這樣的外緣，趙樸初果斷地提出了「佛教是文化」之觀點。此後在諸多場合及文章中，趙樸初都直接提到佛教所涵蓋的文化屬性，⁵明確強調「佛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⁶

由上可知，趙樸初之所以提出「佛教是文化」這一觀點，乃出於對治「文化熱」思潮中所產生的某種「文化偏見」，這固然屬實，但如果要理解他所揭示的其時文化界對傳統文化所存在的認識誤差與偏見現象，則需要回顧和檢視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文化熱」所討論的相關話題。

3. 趙樸初：〈要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趙樸初文集》，頁 799。
4. 趙樸初：〈關於進一步落實宗教政策的有關問題〉，《趙樸初文集》，頁 922。
5. 趙樸初與此觀點相應的文章大致還有：〈佛教和中國文化〉、〈年輕僧人要善於工作、善於學習〉、〈要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關於佛教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關係〉、〈中國佛教的過去和現在〉等相關文章，見《趙樸初文集》。
6. 1950 年代，趙樸初曾提到佛教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如〈佛教在中國〉一文中稱：「佛教的極盛時期正是中國古代文化燦爛的時期。佛教徒的往來，對於中國和印度及西域各國的學術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佛教曾起了主要的媒介作用。」（《趙樸初文集》，頁 143-145）。〈中國的佛教〉一文中：「佛教在中國不僅是開放了它本身的智慧之花，而且伸張到文化各方面的枝葉也是非常茂盛的……通過佛教徒的往來，中國不僅吸收了外來的文化，同時也盡了輸出文化的責任」（《趙樸初文集》，頁 186-187）。但趙樸初明確提出「佛教是文化」之觀點，還是在 1986 年學界「文化熱」之普遍興起階段。

二、學界「文化熱」與教界「文化論」

(一)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文化熱」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的「文化熱」現象，是一種尋求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文化解釋以及公共熱情的普遍性釋放。比如，文學上有「傷痕文學」、「尋根文學」等作品形態出現；繪畫上《父親》、《西藏組畫》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哲學上徘徊的是尼采與薩特的身影；音樂上傳唱的是《小城故事》與《一無所有》；服飾上由一律的藍卡土灰變成大紅大紫。這些多面的勢態產生了廣泛影響，彰顯



《父親》是中國畫家羅中立於1980年創作的油畫，超寫實的風格極具悲劇性的震撼力。

了八〇年代中國民眾精神世界的特徵，後人將這些特徵歸結起來，視作普遍的「文化熱」現象。

如果狹義地探究「文化熱」的具體年限及其思想核心，還須以八〇年代中期文化界的探討為基準。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甘陽的表述中得到驗證：「中國大陸1985年興起並在隨後的兩年中達到高潮的『文化熱』，如今已被海內外普遍看作是繼『五四』以來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反思運動。」⁷甘陽進

7. 甘陽主編：〈初版前言〉，《八十年代文化意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一步指出「文化熱」是一大「顯學」，其興起的背後將面臨一場關於中國文化的大討論。⁸他認為，這場大討論的背景其實與當時整個中國的政治導向直接相關：

粗略說來，自十年動亂結束，現代化的任務被重新提出以來，中國人走了三步才走到文化這個問題上來：首先是實行對外開放、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隨後是加強民主與法制並進行大踏步的經濟體制改革，因為沒有相應的先進管理制度，先進技術有等於無；最後，文化問題才提到了整個社會面前，因為政治制度的完善、經濟體制的改革，都直接觸及到了整個社會的一般文化傳統和文化背景、文化心理與文化機制。我以為，這就是今日『中國文化熱』和『中西比較風』的真正背景和含義。⁹

在一些文化人眼中，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既是當代中國歷史上令人心動的浪漫年代，又是一個人文風氣濃郁、文藝家和知識分子引領潮流的時期。面對其時問題討論之深度與廣度，李陀認為該有一門「八十年代學」。¹⁰陳平原認為，八〇年代的文學、學術、藝術等，是一個整體，有很明確的社會關懷與問題意識。¹¹

陳來以三大「文化典型」加以考察：以金觀濤為代表的「走向

8. 甘陽在〈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提到：「1985年以來，所謂的『文化』問題已經明顯地一躍而成為當代中國的顯學。從目前的陣陣『中國文化熱』和『中西比較風』來看，有理由推測：八十年代後期，一場關於中國文化的大討論很可能會蓬勃興起。」甘陽主編：《八十年代文化意識》。

9. 甘陽主編：〈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八十年代文化意識》。

10. 李陀認為：「八十年代問題之複雜、之重要，應該有一門『八十年代學』」。見查建英主編：《八十年代訪談錄》，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頁9。

11. 查建英主編：《八十年代訪談錄》，頁136。

未來」文化活動，表現出強烈的科學主義，缺乏自覺的文化意識；以解釋學出身的甘陽為主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較偏於西方文化，且帶有某種反傳統的色彩。兩者代表性地反映了思想界的文化批判思潮；而湯一介創辦的「中國文化書院」，則是文化的自覺參與者，並且是實際上是推動者之一。陳來最後認為，「『走向未來』的科學精神，『文化：中國與世界』的文化關懷，『文化書院』的傳統憂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年中國大陸文化討論的幾個側面」。¹²

據上可知，無論是陳平原的「同氣相求的理想情懷」，抑或是陳來的「科學精神、文化關懷與傳統憂思」，都不約而同地指向「文化熱」的核心旨趣，這些思考代表了其時文化界所討論或關心的話題，以及知識分子面對中國現實的種種關切。¹³正是在這種時節因緣下，趙樸初作為文化思潮的參與者和推行者，借助文化思潮來推動佛教傳播，提出「佛教是文化」的著名論斷。

（二）「佛教是文化」的立論依據

趙樸初在論證「佛教是文化」時，要點有二：1. 強調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性，2. 列舉著名人士對於佛教文化屬性界定的具體事例。

12. 陳來：〈思想出路的三動向〉，見甘陽主編：《八十年代文化意識》，頁542-545。

13. 在「文化熱」興起之後的1988年，張家聲、蘇曉康、王魯湘等人錄製的《河殤》亦同樣彰顯了文化的對話與反思。「河殤」就是「黃河之死」，片子主要表達了一個中心意思：否定中華五千年文明，把中華文明說成是「黃色文明」，西方文明是「藍色文明」。「黃色文明」是大陸文明，就是封建專制；「藍色文明」是海洋文明，就是民主和自由。並主觀臆斷地說中國應該拋棄有五千年歷史的黃色文明，推行西方的藍色文明。片子通過黃河黃濁的水流，及黃河兩岸貧困荒涼的歷史和現實景象，刻意渲染中華民族在「黃色文明」的摧殘下如何落後，與在「藍色文明」滋養下的西方發達國家差距如何強大。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期

第一，強調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性。在〈佛教和中國文化〉一文中，他總結了中國佛教特徵，即「三性」說和「三化」說。「三性」指的是全面性、豐富性與廣延性。「全面性」是指，長達二千年的歷史時期中，中國傳入了印度佛教三時期的全部內容，形成了三大語系的佛教。「豐富性」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為典籍的浩瀚，二為宗派的繁多。「廣延性」是說，中國漢藏兩語系佛教廣泛流傳到其他民族和國家，如漢語系佛教傳入朝鮮、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語系佛教傳入蒙、滿各族；近代，這兩語系的佛教又傳入歐、美各國。¹⁴

所謂「三化」，則是學術化、藝術化與社會化。「學術化」：佛教傳入中國伊始，知識階層就把佛教作為一種思想學說，講、錄、著、述，蔚然成風，在教理、教義的研究方面很快就達到很高的水準。¹⁵「藝術化」：大乘佛教傳入後，吸收了漢文化的長處，引起畫像、造像、寺塔建築等藝術和工藝的發展，使佛教面目煥然一新。¹⁶「社會化」：中國大乘佛教繼承和發展了龍樹的「一切資生事業悉是佛道」和彌勒的成佛必須修學五明的思想，禪宗六祖惠能提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使佛教與社會生活打成一片，大乘真正發展為「人間佛教」，佛教與中國文化已無法分割。¹⁷趙樸初這種將佛教傳播與佛教精神相糅合的論證，善巧地說明了佛教所涵蓋的文化屬性。

第二，列舉著名人士對於佛教文化屬性界定的具體事例。趙樸初曾舉出胡適、范文瀾、毛澤東、錢學森對於佛教文化的認識和

14. 趙樸初：〈佛教和中國文化〉，《趙樸初文集》，頁 698-699。

15. 同註 14，頁 700。

16. 同註 14，頁 700。

17. 同註 14，頁 701。

看法：胡適因為不懂佛學，寫《中國哲學史》半途輟筆；¹⁸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早年對佛教完全否定，晚年開始系統研究佛教，曾說，不懂佛學就不能全面弄懂中國文化；¹⁹毛澤東在延安出門散步時，想去看佛教寺廟，旁人認為佛教是迷信，沒什麼看頭，毛澤東說，那是文化；²⁰科學家錢學森認為，宗教是文化。²¹



毛澤東（右）、錢學森都承認佛教是文化。

我們可以看出，趙樸初旨在通過強調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性，以及列舉學術、政治、科學等領域的權威人士對佛教的認識，²²為「佛教是文化」這一論斷進行了有力論證。因此，無論就其合理性與正確性而言，均得到相關人士的回應與認同。當代學者楊曾文就認為：「從中國歷史文化考察，趙樸初居士說的『佛教是文化』是完全正確的。」²³

18. 趙樸初：〈要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趙樸初文集》，頁 799。

19. 趙樸初：〈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趙樸初文集》，頁 808。

20. 趙樸初：〈中國佛協要加強理論研究工作〉，《趙樸初文集》，頁 958。

21. 同註 20。

22. 聖凱認為：「趙樸老提這三個人是有歷史深意的，毛主席是偉大的革命家，范老是著名的歷史學家，錢老是當代的大科學家，三個人分別代表了政治、文化、科學，都承認佛教是文化，這對他提倡『佛教是文化』無疑提供了最好的證據。」聖凱：〈趙樸初「佛教是文化」的再思考〉，《當代宗教媒體的定位與責任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玉佛寺，2010 年。

23.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主編：〈再版序言〉，《俗語佛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2。

三、「佛教是文化」的歷史抉擇

趙樸初在「文化熱」的思潮下，出於糾正某些文化「偏見」而提倡「佛教是文化」，同時亦在揭示文化與佛教大乘精神不相違背的內在邏輯，並且，更與其一貫的思考更有諸多關聯，大致有三：1. 從「一種思想三個傳統」到「佛教是文化」之細化；2. 從宗教「五性」到佛教「六性」之遞進；3. 從「佛教是文化」到「兩個文明」之適應。

（一）從「一種思想三個傳統」到「佛教是文化」之細化

佛教傳入中國數千年之久，洋洋大哉。究竟什麼是佛教傳統？其實新中國成立伊始的佛教界，對於傳統之界定尚不明晰。這一點我們可以從 1953 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的章程可以得到驗證。其時中國佛教協會的辦會宗旨為：「團結全國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參加愛護祖國、保衛世界和平運動，協助人民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並聯繫各地佛教徒發揚佛教徒優良傳統」。²⁴ 雖然提到了發揚佛教徒優良傳統，但是佛教傳統所指為何，實際包括哪些方面，並未明確地界定。趙樸初當時在〈關於中國佛教協會發起經過和籌備工作的報告〉中，關於佛教傳統的論述是：

如何發揚佛教優良傳統。這要聯繫到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僧伽制度的健全問題，一是教理的研學問題。僧伽制度的健全，是弘法利生事業的基礎。這怎樣針對過去的弊病和現在僧團內的複雜情況，依照戒律的原則，實際解決目前存在著的一些問題，使今後的僧伽得以恢復「六和」的意

24. 趙樸初：〈關於中國佛教協會發起經過和籌備工作的報告〉，《趙樸初文集》，頁 51。

義，這實在是一件重要的事。至於教理的研學問題，一般的說，是僧尼的宗教教育問題，是僧尼人才培養問題，就學術上說是應當是在近幾十年已有的基礎上，組織對各宗派學說進行系統研究的問題。²⁵

在這裡，他也只是提到發揚傳統要關注「僧伽制度」與「教理研學」兩個關鍵問題，而未有具體所指。

1956年，趙樸初提到：「佛教優良傳統是多方面的，而發揚佛教優良傳統的方法也是多是多樣的。……在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中，最特出而最主要的是如下的三個：一、捨身求法的精神。二、嚴謹的翻譯作風和精密的治學方法。三、對國際文化交流的努力。」²⁶這裡強調的佛教傳統是指佛教徒的苦心修行、對於經典的研習，以及佛教對外交流的作用。由此可見，趙樸初關於佛教傳統的認識界定呈現出一種多樣化的、逐步遞進的過程。而其所謂「三大佛教傳統」的真正完善，則是在30年之後。

1983年，在紀念中國佛教協會30週年的工作報告中，趙樸初曾站在歷史與現實的高度，提出了「一種思想三個傳統」的指導方針。一種思想是指人間佛教思想；三個優良傳統，指農禪並重的傳統、注重學術研究的傳統、國際友好交流的傳統。他說：

我們社會主義中國的佛教徒，對於自己信奉的佛教，應當提倡人間佛教思想，以利於我們擔當新的歷史時期的人間使命；應當發揚中國佛教農禪並重的優良傳統，以利於我

25. 同註24，頁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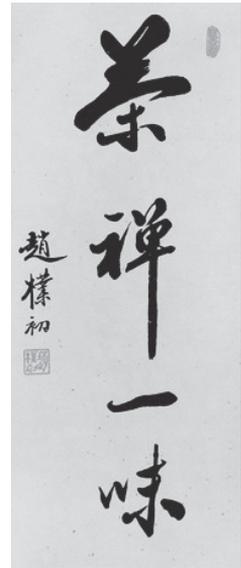
26. 趙樸初：〈英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趙樸初文集》，頁153。

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應當發揚中國佛教注重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以利於我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應當發揚中國佛教國際友好交流的優良傳統，以利於我們積極參加增進同各國人民友好，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²⁷

不難發現，趙樸初在五〇至八〇年代所提的佛教傳統的漸次過程中，或多或少地揭示了「佛教是文化」的某種跡象，例如「教理研學」、「文化交流」、「學術研究」等等。由此可知，趙樸初在宣導「一種思想三個傳統」之後提出「佛教是文化」，並不是重新分判，而是有著一脈相承之連貫性；換句話說，「一種思想三個傳統」是基於佛教的全盤把握，而「佛教是文化」則從文化角度進一步細化。

（三）從宗教「五性」到佛教「六性」之遞進

自從「佛教文化論」提出之後，趙樸初便在諸多不同場合表達佛教的文化屬性。隨著佛教事業的逐步開展，以及學術界參與的相關學術研究，佛教的文化特徵變得逐漸明晰，並且不斷為時人所熟知。²⁸ 然而，趙樸初對佛教的文化思考並沒有因此



趙樸初提出「佛教文化論」後，經常在不同場合表達佛教的文化屬性。圖為他的書法《茶禪一味》。

27. 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趙樸初文集》，頁 562-563。

28. 杜繼文在〈從中國佛教看中國文化的走向〉一文指出：「時至今日，不清楚是否還有學者仍認為中國佛教不屬中國文化的範疇？就我所知，質疑者甚少。原因很簡單：佛教傳入中土的年代，或許比西方的紀元還早，自魏晉以來，它在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領域內的作用，已經成為不容抹殺的史實。」杜繼文：《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2。

停止，而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煉，這便是由宗教「五性」²⁹ 延伸到佛教「六性」。

趙樸初曾指出，「（佛教）除了『五性』是各宗教共同具備的之外，我國佛教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和中國文化的悠久深厚的關係，這尤其是我們佛教徒所應當知道，應當研究，應當宣傳，讓群眾重視的。『五性』加上文化關係，是我們中國佛教固有的特點和有利的條件」。³⁰ 這句話揭示了中國佛教在宗教「五性」之外，理應加上「文化性」。後來他又提到，「我國佛教典型地具有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複雜性、長期性等五性，還具有顯著的文化性」。³¹ 可知在趙樸初的理解中，宗教「五性」似乎不能完全涵蓋佛教的整體意蘊，佛教與其他宗教的不同之處，也在於其具有鮮明的「文化性」特徵。由此，他在宗教「五性」的基礎上，總結出中國佛教的「六性」特徵。

（四）從「佛教是文化」到「兩個文明」之適應

趙樸初一再重申，大乘佛教精神的體現在於佛教入世性的彰顯。他認為，佛教與社會主義建設是密切相關並且互補的：「宗教

29. 宗教「五性」指：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複雜性、長期性，是1950年代初李維漢所總結。趙樸初〈宗教界人士要積極發揮參政議政的作用〉一文中提到：「我們今天常常談到宗教的『五性』就是由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主持下研究提出來的，我把它叫做『宗教五性論』。」（《趙樸初文集》，頁997）。另在〈關於政協宗教委員會的工作〉一文中提到：「五十年代初，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份總結民族工作基本經驗的文件中，提出了宗教的五性——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複雜性、長期性，得到了毛主席、周總理、劉少奇同志的肯定。五性論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的充實和發展，今天仍有現實指導意義。」（《趙樸初文集》，頁1076）。

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趙樸初文集》，頁1236。

30. 趙樸初：〈關於上海的佛教工作〉，《趙樸初文集》，頁926。

31. 同註29。

和社會主義社會是可以相互協調的，要有兩個方面的條件：一是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認真貫徹和落實；二是教徒愛國愛教為四化服務。」³² 我們似乎可以這麼理解，佛教不依賴於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宗教政策）則法事難立，佛教徒不為四化服務（奉獻眾生）便失去了佛教的存在意義。關於這一點，趙樸初在宣導「人間佛教」時尤為明顯：

我提「人間佛教」實際就是從使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相協調的角度提的，這在佛教教義上有根據。當然，這是提倡的重點，並不包括佛教的全部內容。協調有兩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方面要貫徹宗教信仰自由，一方面佛教徒要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光強調一方面不行，這與佛教思想是不一致的。今天這樣提是為了更好地鼓勵佛教徒為社會主義服務。³³

由此可知，趙樸初「佛教文化論」的提出，同樣旨在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建設服務。他從歷史經驗出發，認為佛教「對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起了很好的作用，（過去）三十多年來，佛教徒為社會主義建設作的貢獻是相當大的。……我認為佛教在精神文明方面也能起作用，應該肯定」。³⁴

至於佛教如何服務社會，趙樸初認為，佛教要在宗教政策的落實下，在愛國愛教的前提下，提倡佛教的文化功能，發揚佛教的傳統精神，從而為「兩個文明」的建設服務，他說：「社會主義時期

32. 趙樸初：〈在佛教視察工作時的講話〉，《趙樸初文集》，頁 1052。

33. 趙樸初：〈關於佛教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關係〉，《趙樸初文集》，頁 757。

34. 同註 33，頁 752。

的佛教，應該如何結合時代發展的趨向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呢？重要的是要吸取佛教文化的精華，要發揚人間佛教的精神。」³⁵據此而言，趙樸初的「佛教文化論」，其實是對中國佛教進行重新詮釋的結果。他強調佛教是文化，就意味著佛教非迷信、佛教能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相適應、佛教能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由此彰顯出佛教文化的深遠意義。

換句話說，「佛教文化論」為我們呈現的是一個靈活的有機體。趙樸初並非簡單地出於糾正「文化熱」思潮的文化「偏見」，而是在宗教政策能允許、文明建設有需求的情形下，進行佛教文化與佛教精神不相悖離的圓融整合。就這個意義而言，如果說歐陽漸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學」，是為佛教爭取生存空間，那麼趙樸初的「佛教文化論」，同樣是為了能使佛教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社會，而爭取文化認同的廣大生存空間。

四、「佛教是文化」之影響

（一）學界之回應——撰文與著述

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八〇年代思潮的迸發下，學術界關於宗教領域的研究，也開始從過去「研究宗教是為了批判宗教」的觀念中逐漸轉變，以一種相對理性的態度重新估量宗教價值。學界的這種轉變，其標誌性事件便體現在回應「佛教是文化」上。

1986年，中華書局組織《文史知識》編輯部著手編輯「佛教與中國文化」專號。趙樸初在「專號」內發表文章，具體提到佛教影響文化的諸多方面：

35. 趙樸初：〈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趙樸初文集》，頁801。

《人間佛教》學報 · 藝文 | 第三十期

佛教哲學本身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概念的分析，有著獨到的見解。佛教對中國文化有十分深刻和廣泛的影響。如文學方面、音韻學方面，藝術方面，伴隨著佛教俱來的還有天文、音樂、醫藥等的傳習；佛教各宗派學說，對中國思想界也起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佛教文化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影響如此之大，要搞中國古代文、史、哲、藝術等研究，不搞清它們與佛教文化的關係及所受的影響，就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也不可能總結出符合歷史實際的規律。³⁶

同在這期「專號」中，季羨林、周紹良、黃永年、袁行霈、方立天、楊曾文、杜繼文等諸多知名學者，分別從「佛學論壇、佛教史略、佛籍談叢、佛祖信仰、佛教人物、佛學源流、佛教常識、名山聖跡」等八個方面，對佛教文化的內容進行具體而細緻的評述。

其中，方立天就「佛教是文化」作出了回應。他提出中國佛教具有調和性、融攝性、簡易性三種特性：「調和性」，對佛教外部思想的調和，基本上和中國古代社會思潮的變化相適應；「融攝性」，中國佛教統攝佛教各類經典和佛教各派學說，統一佛教各地學風；「簡易性」，中國佛教真正綿延不絕的是禪宗和淨土宗，這與其教義和修行方法的簡易有很大關係，簡易性是中國佛教區別於印度佛教的特色。³⁷

36. 趙樸初：〈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趙樸初文集》，頁 804、808。

37. 方立天：〈略論中國佛教的特質〉，《佛教與中國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10 月出版，頁 37-41。



佛教傳入中國後，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圖為山西平遙鎮國寺的萬佛殿。

楊曾文則認為：「佛教發源於印度，傳到中國後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互影響、吸收，發展成為中國的民族宗教之一，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對哲學、文學、藝術等其他文化形態，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³⁸

自「佛教文化論」提出之後，趙樸初等人圍繞相關論點的敘述，經過佛教同仁的熱心編輯，成為《佛教與中國文化》一書，更激發了學者們的認同感，並促進他們開始關注佛教與文化關係的研究興趣。陳兵在〈中國 20 世紀佛學研究的成果〉一文中，介紹了佛教文化研究的成果，大致有：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與《中國佛教文化》（1988），蘇淵雷《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1988）、孫昌武《中國佛教文化序記》（1990）、魏承思《中國佛教文化論稿》（1991）、中華書局編《佛教與中國文化》（1990）、賴永海

38. 楊曾文：《佛教在中國的流傳和發展》，《佛教與中國文化》，頁 49。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三十期

《佛學與儒學》（1992）、洪修平《中國佛教文化歷程》（1995）、王堯、陳楠主編《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1996）論文集等。³⁹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其他學者的後期研究成果中得到具體驗證，如與佛教文化相關的研究著作大致還有：樓宇烈《中國文化中的釋儒道》、賴永海《中國佛教文化論》、張弓《漢唐佛教文化史》、高振農《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洪修平《中國佛教文化的歷程》、任道斌《佛教文化辭典》、薛克翹《佛教與中國文化》等。以上所舉，可說是研究佛教與中國文化的代表性專文或著述。

（二）教界之互動——建所與辦刊

似乎可以這麼認為，「佛教文化論」直接催生了「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成立。1987年4月23日，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在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北京廣濟寺內正式成立，⁴⁰ 並且創辦了所刊《法音》學術版（後更名為《佛教文化》年刊），⁴¹ 此外，該所還陸續編輯了「佛教文化叢書」，以及舉辦專家講學等活動。⁴² 與此

39. 陳兵認為：「80年代後期以來，大陸佛學研究出現一股『文化熱』，將佛教看作一種文化，看作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佛教與中國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繫。」陳兵：〈中國20世紀佛學研究的成果〉，《宗教學研究》1999年第3期，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40. 1991年8月，研究所從廣濟寺遷至北長街「三時學會」舊址。

41. 原《佛教文化》年刊已辦三期，為加強和深化佛教文化的學術性，1992年底改為以專家學者為對象的《佛學研究》年刊及副刊《佛學研究資料》，作為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學報。同時，為接引社會各界人士，引導人們對佛教文化的正確認識和關注，原《佛教文化》改為綜合性刊物（季刊，翌年改為雙月刊），以一般讀者為對象。

42. 趙樸初〈中國佛協要加強理論研究工作〉一文中提到：「佛教文化研究所，並不是我們所內的人能擔當起所有任務，所以我們請外頭的專家當特約研究員，請他們寫論文，講學，比方佛教美術、雕塑方面麼，金維諾是我們的特約研究員，應當請他來，請他寫專題論文或講學。我已經談了，來我們這裡講學，應當比北大、清華待遇要高一些。」見《趙樸初文集》，頁960。

相應，各地區的佛教文化事業逐步開展，尤其江浙以及沿海一帶經濟基礎比較富庶的地區，更是如雨後春筍般進行，數十種佛教雜誌便在其後不同的時期中陸續得到恢復或創辦。

王雷泉曾進行中國大陸地區宗教文章的資料統計。據其統計，1980-1990 年間，大陸各大刊物刊載的佛教文章總量為 4069 篇；⁴³ 如果以趙樸初提出「佛教文化論」為時間分界點，可發現：1980-1985 年間的佛教文章數量為 1526 篇，1986-1990 年間的佛教文章數量為 2543 篇。另據黃夏年考證，以討論為性質的佛教會議也在不斷升溫，1980-1985 年有 4 次，1986-1990 年共 13 次。⁴⁴ 很明顯，自「佛教文化論」提出之後，佛教文章與佛教會議在數量上皆超過以往一半以上。

另據溫金玉考證，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來，大陸與佛教相關的刊物大致有四類：一、中國佛教協會刊物；二、以書代刊的叢書方式研究成果；三、教外研究機構純學術刊物；四、各級佛教協會與佛學院舉辦教內流通刊物。而在第四欄中，其所列大陸佛教刊物有 172 種之多。⁴⁵ 他認為，佛教刊物興盛的原因有五點：首先，大陸政策層面的開放，是佛教得以恢復並迅速發展的根本原因。其次，大陸經濟的快速增長，是當代中國佛教發展的增上緣。第三，佛教的文化性彰顯，在意識型態層面的束縛愈來愈少；而從文化的角度，對社會的影響力愈來愈大。第四，佛教界弘法主體意識的確立，為

43. 王雷泉主編：《中國大陸宗教文章索引》目錄（佛教類），台北：東初出版社，1995 年。

44. 黃夏年：〈二十世紀的中國佛學研究〉，《中國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年。

45. 溫金玉：〈千燈互照：大陸地區佛教期刊的發展〉，《佛教圖書館館刊》第 57 期，台北：伽耶山基金會，2013 年，頁 46-50。

佛教文化的發展也提供了內驅力。第五，教界與學界的和諧互動，也是佛教文化發展的助力。⁴⁶

上引資料表明可知，由於傳播的形式更新，佛教在新時期的社會環境下不僅局面隨之一變，而且文化層面的影響力度也在逐步上升。

（三）持續之影響——佛教文化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再思考

自趙樸初 1986 年提出「佛教文化論」一直到今天，轉眼已近 30 年。其所構成的持續影響，不僅使學界有同氣相求之長期回應，而且針對佛教本身所涵攝的「文化性」更有重新的思考與延伸。黃夏年認為，佛教「禪宗文化熱」是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文化熱」的表現形式之一。⁴⁷ 賴永海在《中國佛教文化論》序言中闡明，該書核心在於「主要探討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相互關係，這種探討既致力於剖析佛教如何受中國傳統的影響而逐步走上中國化的道路，有著重研究佛教在中國紮根之後，怎樣反過來影響中國傳統文化並與傳統文化相結合，演變為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⁴⁸

46. 溫金玉：〈千燈互照：大陸地區佛教期刊的發展〉，《佛教圖書館館刊》第 57 期，頁 51-52。

47. 黃夏年〈如何看待禪宗熱〉一文稱：「佛教是一種宗教，也是一種文化現象。禪宗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影響了很多領域，因此它具有很強的文化功能，表現了強烈地文化特點。當中國出現了文化熱時，禪宗為代表的禪文化自然也就成為人們首選的一種文化代表，於是隨著文化熱的不斷展開和深入討論，禪宗的文化現象也日益顯示出其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歷史作用，事實上，不把禪宗文化說清楚，也就說不能說清楚中國文化的特點和內涵，所以禪宗的熱又是一種文化熱的具體表現之一。」黃夏年：〈如何看待禪宗熱〉，《中國宗教》1995 年第 3 期，北京：中國宗教雜誌社。

48. 賴永海：《中國佛教文化論》跋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

2006年，方立天在「佛教文化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提出了「文化佛教」的概念。他認為，「文化佛教」是人間佛教建設的重要途徑：

佛教文化是佛教的重要載體，是佛教的重要表現形態。佛教是宗教，也是文化。我們通常說佛教文化，現在我們也說「文化佛教」。那麼「文化佛教」與「佛教文化」有什麼區別，「文化佛教」的概念是什麼呢？我們認為，「佛教文化」是佛教的文化意蘊，是佛教性質的文化類型；「文化佛教」則是指文化層面意義的佛教，是作為文化形態的佛教，也就是說「文化佛教」是對佛教的文化解讀、詮釋與文化整合、構建，是對佛教文化的創造性轉換。「文化佛教」的概念展現了文化自覺，彰顯了佛教的文化意義，有助於發揮佛教的文化功能，和文化作用。⁴⁹

方教授接著指出「文化佛教」內涵的多重性以及概念的獨特性，⁵⁰並且強調：「信仰是『文化佛教』內涵的一個重要方面，信仰與文化不是簡單的內在與外在的關係，『文化佛教』是佛教的

49. 方立天：〈關於人間佛教的文化思考〉，收入方立天、學愚主編：《佛教傳統與當代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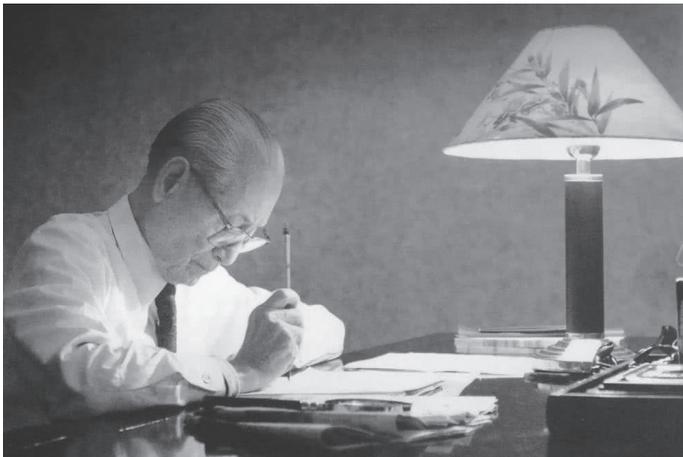
50. 方立天〈關於人間佛教的文化思考〉一文認為，「文化佛教」的內涵可以分出五個方面：一、內在與外在的信仰。二、倫理道德；三、哲學理念；四、文學藝術；五、民風習俗。而「文化佛教」的獨特性在於「與精英佛教、貴族佛教、平民佛教、大眾佛教、義理佛教、修持佛教、制度佛教等概念一樣，它並不反映佛教整體的內涵，而是就佛教內涵的某一層面、某種特質而言的，是一個反映佛教特定層面和一定意義的概念。但是我們認為，『文化佛教』這個概念，對於認識和把握佛教，對於佛教的生存和發展，都是有重要意義的」。見方立天、學愚主編：《佛教傳統與當代文化》，頁9-11。

文化性與宗教性的統一，強調文化並不會削弱信仰。」⁵¹ 似乎可以說，黃夏年、賴永海、方立天等學者的觀點，是接續了趙樸初「佛教文化論」的思考，並有所提煉與延展。

結語

「佛教是文化」是趙樸初居士面對佛教在中國歷史傳承中，結合社會現實，進行整體思考所提出的。綜上所述，我們認為：

第一，「佛教是文化」反映了趙樸初觀照佛教的文化自覺。在近現代中國社會的巨大進程中，趙樸初作為一名佛弟子，其深厚的家學淵源、文化積累以及社會歷練，培養了他善於從整體上觀照、把握，甚至定位佛教的自覺意識。也正是這種鮮明的自覺意識，使趙樸初能夠觸摸傳統洞察現實，剖析文化思潮之偏頗，詮釋佛教文化之精華，由此揭示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佛教是文化」之模式。



趙樸初文化素養深厚，「佛教是文化」反映出他觀照佛教的文化自覺。

51. 方立天：〈關於人間佛教的文化思考〉，《佛教傳統與當代文化》，頁 11。

第二，「佛教是文化」揭示了佛教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國文化思潮中的發展勢態。趙樸初提出「佛教是文化」，目的在為佛教的存在作證明。他巧借「文化熱」，將佛教嵌入民族文化的集體記憶之中，進行「文化調適」。這種調適不僅與「一種思想三個傳統」有著一脈相承的連貫性，同時彌合了佛教與宗教政策、文化思潮、社會建設等方面的密切關係，並且又不乖離佛教之核心價值。換句話說，如果「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趨向於「導俗歸真」，那麼「佛教是文化」則可稱之為「回真向俗」。

第三，「佛教是文化」引導了佛教的文化走向。回顧過去數十年中國大陸的佛教發展脈絡，道場恢復可說是佛教文化發展的硬體基礎，而文化弘揚則成為佛教發展的上層建築。因此，「佛教文化論」不僅標舉了佛教的文化屬性，而且使佛教入世的「在場性」進一步得到重視與延展。從目前佛教的發展情況來看，採取文化形式進行佛教弘揚的團體或機構日益增多。由此推知，「佛教文化論」模式在未來的佛教發展趨勢中，還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中華文化主張三綱五常，主要在孝道的闡明。孝，是對親人一種至真感情的流露；孝，是人我之間應有的一份責任；孝，是人倫之間的一種密切關係。擴而充之，對兄弟的孝就是悌，對朋友的孝就是義，對國家孝就是忠，乃至對眾生的孝就是仁。要重整倫理道德，應從發揚孝道精神做起。——《人間佛教語錄》